

巴黎骚乱对我国城市规划与管理的启示

邱国兵

摘要:巴黎郊区的骚乱,与其人口高密度、居民结构单一和阻碍社会流动的社区设计思路与原则紧密相关。现在的城市规划,需要提出混合式居住空间的新思路和方案,即要在一个社区、一个邻里单位甚至一栋楼内,为收入在不同档次的家庭创造居住空间,使他们有共同参与公共事务和活动的机会,有助于培养社会的凝聚力。

关键词:巴黎郊区骚乱;城市规划;管理;混合式居住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6)02-0090-04

2005年10月末到11月中下旬,一场大骚乱袭击了原本“平静”的法国巴黎郊区。事件的起因是10月27日克利希苏布瓦镇的两名刚看完球赛的北非裔男孩,误以为警察在追捕他们,慌不择路跑进了一所变电站,结果被2万伏的高压瞬间夺去了生命。三天后,上千名主要移民自北非和阿拉伯地区的居民走上街头,抗议警察对他们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到巴黎郊区其他类似的移民区,招致数名警察受伤,多名骚乱者被逮捕并被判处监禁。随着事态的发展,骚乱者跟警察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偷偷点燃汽车、政府大楼、商店、工厂、超市,甚至幼儿园,大骚乱日渐恶化。这场看似偶然的突发危机,直到11月中下旬才逐渐被平息。

在对这场骚乱的分析与反思中,法国政府不适当的移民政策,以及北非和阿拉伯移民在就业、置业和教育等方面受到的歧视和排斥,无疑是骚乱发生和恶化的主要原因,但是人口高密度、居民结构单一和阻碍社会流动的社区设计思路与原则,同样是这次恶性事件爆发的重要肇因。因此,从城市管理和城市设计的角度剖析巴黎骚乱,对我国科学合理地规划与管理城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柯布西耶:“住房是居住的机器”

从城市管理和社会学角度看,这场大骚乱与巴黎郊区的人口密度、居住环境和人口流动状况紧密相关,而这些因素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城市设计思路和取向的影响。巴黎郊区的城市设计,尤其是居民区的规划深受20世纪初法国著名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影响。在法国,勒·柯布西耶与沃尔特·格罗庇乌斯(Walter Gropius)、密斯·德罗(Mies van der)和弗兰克·莱特(F. L. Wright)并称为现代建筑的第一代四位大师。尤其是柯布西耶所著的《走向新建筑》一书被称为现代建筑运动的宣言,大工业时代的乐观、整齐划一、崇尚批量生产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城市规划和设计风格,这使他相信修建城市、房屋与制造汽车、飞机等机器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在柯氏看来,城市建设、发展与制造飞机、汽车一样,都是在数学与几何计算、新材料的选择和运用

收稿日期:2006-02-12

作者简介:邱国兵(1981—),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2004级行政学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233

的基础上展开的大规模工业生产。由此,柯布西耶提出“住房是居住机器”的著名口号,主张运用现代技术,创造居住空间上的最大效率,进而设计规划出巨型的居民公寓。

柯布西耶极度推崇工业化带来的高效率,坚信“只要大批生产的精神面貌产生,一切都将在眨眼之间很快创建起来。”^{[1](P197)}相反,对于传统的田园诗式的建筑和居住理念,柯布西耶则嗤之以鼻:“我们在城市里和近郊区没有住宅,只有诗,秋天里的春天的诗,……而这个时刻,人已经很衰老,受风湿病和死亡的折磨……活得很费劲。”^{[1](P205)}可见,他把这些都当作是累赘的、繁复的必将为“时代精神”所抛弃的桎梏,对传统的城市和建筑审美情趣没有丝毫好感。正是基于此,柯布西耶试图以工业大生产的精神去替代那些所谓已经过时的风格,强调“大工业应当从事建造房屋,并成批地制造住宅的构件。必须树立大批量生产的精神面貌:建造大批量生产的住宅的精神面貌,住进大批量生产的住宅的精神面貌,喜爱大批量生产的住宅的精神面貌。”^{[1](P195)}这样看来,能跟上时代节拍的城市设计和建筑风格,必须是简单、简洁、统一、整齐的,比如在建筑材料上,柯布西耶就鼓吹“用质地稳定的(人工)材料代替变化无穷的天然材料”^{[1](P200)}。在单体建筑的设计中,柯布西耶去除了以往楼宇设计形式的繁文缛节,大量采用横平竖直的线条,其建筑往往以贯穿整个外墙面一排行平行的窗户为标志。这种横平竖直样式的房屋,更像是工业设计的制成品,甚至可以凭预制件直接搭建起来。

不难看出,柯布西耶的城市建筑新理念包含着明显的崇尚机械式的科学、民主和平等的成分,他对新建筑精神的宣扬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让更多体力工人、低收入者等社会中下层都拥有卫生、体面的居所。他认为:“从根本上改造大城市的出路在于运用先进的工程技术减少城市的建筑用地,提高人口密度”^{[2](P16)},只要实施得当,就可以实现“既保持人口的高密度,又形成安静、卫生的城市环境”^{[2](P16)}。为了使房屋价格控制在这些低收入者可承受的范围内,就必须使“居住机器”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人口。

应该说,这一套挑战传统的城市建筑设计理念,对于欧洲拥有丰厚历史和人文传统的城市,是没有多大的市场的,相反却在空白土地面积广大、没有历史传承和负担的郊区影响较大。于是,在法国许多城市的郊区,建起了大量柯布西耶式整齐划一的高层居民公寓楼,一些原来住在城市的低收入家庭,纷纷迁入这里居住。

二、郊区的居住区设计:法国与美国的不同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世界各国任何主要城市而言,试图将所有居民都安置在市区内居住和生活既不现实也非必要,更会造成市区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秩序混乱、地价高昂等负面效应。因此,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出于不同的原因,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手段,都将一部分居民分流到郊区居住。在郊区居民区规划和设计的模式上,法国和美国在实践和指导思想上就存在巨大的差异。

法国运用勒·柯布西耶的社区规划和建筑理念,在郊区大量建造规格统一、样式整齐的巨型公寓楼,把城里的劳工阶层、低收入阶层全塞到这些钢筋混凝土的格子里。然而,这种设计理念付诸实践后的弊端很快就呈现出来。高层、巨大公寓楼成为移民和贫民的专属聚居区,这些巨型公寓楼很容易沦为犯罪的中心。由于楼层众多,单层面积大,楼道曲折狭长,采光不善,使得这些公寓楼很难被有效管理。楼梯被毒品贩子、皮条客等控制,在夜晚几乎没人敢走。犯罪猖獗的居住区和公寓,甚至不得不炸掉。巨型公寓楼的这种悲剧是具有普遍性的,绝对不是只有法国才会招致可能的骚乱。早在巴黎骚乱之前,美国学者约翰·利维(John M. Levy)就曾指出:“在公房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高层结构不一定能很好地解决所有人的问题……高层建筑相对雷同看上去使高层公房更容易发生犯罪,同时也会使建立社区感和互助感更为困难。”^[3]因此,可以说巴黎骚乱实际上是“勒·柯布西耶式”居住区的骚乱。

为什么勒·柯布西耶原本不错的理念会有这样的恶果？最主要的原因是勒·柯布西耶把建筑看作是建造他的意识形态乌托邦的工具，试图由此设计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为现实中的人类生活服务。他臆想在设计图上画出一条条简洁而优美的平行线条，成千上万的人就能按照他想象的方式生活。可是，人们一旦搬进去以后，这些郊外的巨大公寓楼却渐渐成了一个阶层的居住地，似乎一辈子就在社会中被固定住，很少有流动的可能。这样，柯布西耶式的建筑不是鼓励各阶层之间的融合和沟通，相反把一个阶层和其他阶层隔绝。结果，这种非人性化的“居住的机器”成了“异化的机器”，成为反叛集团的滋生地。

美国的城市发展走的是与法国几乎相反的道路。1934年起，联邦住宅局(the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制定了给独立式住宅提供保险贷款的政策，这一政策鼓励了城市居民涌向郊区的行动。当然，与法国迁往郊区的下层居民不同，美国“下乡”的居民多是家道殷实者。到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为退伍的二战老兵提供无首期抵押贷款的优惠购房政策。这项政策排除了房屋购买和销售双方的风险，选择到郊区居住的人口又一次大幅度增长，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期的经济繁荣。久而久之，在城里上班的中产阶级有财力在郊外购置花园别墅，城里留下的大部分却是穷人，美国遇到的问题反而是大都市贫困化现象，同法国郊区一样，美国市区中破旧的公寓楼成了犯罪的中心。不过这些公寓楼数量不是很多，居住在此的市民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不是特别高，因此反叛力量不容易聚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区别于法国的，就是美国的许多市民，由青年时期刚刚就业时住在喧闹拥挤的城市里，到成家立业育有子女后便移居到环境更安静、面积大得多的郊区房子里，直至子女上大学、走向社会造成的家庭“空巢”化后，又卖掉郊区的大房子，迁到城里的公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和其他阶层混居的几率增大。相比之下，法国的柯布西耶式设计的房子全是一样的型号面积、一样的价格，各阶层的人无法混居，等于在消费中制造了阶级对立。

客观地说，美国的不同阶层居民混合也只是相对的。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而言，由于居住区的分化而导致的分裂现象仍然十分严重，这也招致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市民对城市和社会状况的不满。在1962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中，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最早对城市中心的贫民窟的清理、城市内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功能分区等城市建设原则和策略提出了拷问。这一重要著作已经成为城市规划和设计理论的经典，雅各布斯的理论核心之一就是呼吁城市的不同功能、不同社会阶层和种族之间相互融合，她的理论很快在城市规划与设计行业中获得支持，里昂·克利尔(Leon Krier)的城市设计便是围绕反分区的思路展开的，他提倡在规划中用步行尺度的综合功能的邻里单位，代替单一功能的城市各类小区。

到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规划和设计理论的发展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城市问题的反思，促成了所谓“新城市主义”的出现。与雅各布斯、利克尔一样，“新城市主义”非常重视追求邻里单位的公共空间秩序，提倡用步行尺度和追求邻里个性来推动合理的社区建设和发展。从邻里层面出发的所谓“新城市主义”设计原则包括：首先，一个健康的邻里应该包括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和不同类型的活动；其次，每一个邻里中心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公共空间作为社会和商业交流活动的场所；再次，通过创造一种适合步行的环境，增加邻里范围内不同阶层和背景的人们相互交往，密切邻里关系，形成一种具有浓厚生活氛围的社区；最后，单体建筑设计应该尊重周围的城市理念和当地的传统、习俗。

从柯布西耶的理念到“新城市主义”设计理论的演进和发展，人们对城市和郊区居住区规划的认识，是一个从着重机械、理想化、阶级分层到追求有机、人性化、阶级融合的过程；从城市设计到社区、邻里规划最后具体到单体建筑的设计，又回复到以人为本的出发点上来。正是认识到了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除了遮风避雨的基本生存需求以外，人类更有人际交往、谋求正向的社会流动等要求和渴望。因此，城市设计必须把上述需要作为重要因素考虑进去。

三、我国城市设计：构建和谐的社区和邻里

事实上,现代的城市规划和设计几乎很少能完全摆脱勒·柯布西耶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为广大职工修建了许多苏联式“方格子”居民楼,及至目前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巨型公寓楼又拔地而起,规格也非常整齐划一,市区边缘地带和郊区的居民小区建设更是如此。从法国的经验看,这样的发展势必隐藏着相当的危险性,各社会阶层的分化被不同档次的住房和小区固化和强化,有导致各阶层隔离的倾向。因此,现在我国的城市规划需要提出混合式居住空间的新思路和新原则。

最彻底、最理想化的方案是:在一个邻里单位(小区)、甚至一栋楼内,为不同经济条件和收入水平的家庭创造适合各自居住的空间,让企业家、白领管理层、工人、知识分子、服务员、政府官员和民工等尽可能住在一起,共同参与社区内的社会和政治活动(比如本区(县)人民代表的选举),一同管理所在邻里单位(小区)的公共事务(比如共同商讨选择物业服务公司),一起参加文化休闲、娱乐和体育等活动,还包括让他们的子弟一起上学等。这个方案有助于培养社会各阶层的凝聚力,促进各阶层之间的理解和交流,让大家不论在哪个位置上,都有一种对自己居住共同体的忠诚和热爱。否则,不同阶层的分居就会在利益整合时孕育难以愈合的社会矛盾。

当然,就现实情况来说,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分区居住无疑是主流的模式,而混合居住更多地带有试验或探索的性质。因此,更具有现实意义的应该是相对理想方案次一级的社区规划。在城内社区中建设适合不同阶层居住的住宅,当然这些住宅的造价和售价也会有相应的差异。在郊区社区中进行混合多样的住宅建设,使不同品质和层次的住宅面向和吸引不同收入水平的住户。这样,对于同一阶层住户而言,相近的生活背景会增加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少矛盾。同时,在整个社区,各个小的邻里和单个建筑又能形成互相兼顾和搭配的“高层—小高层—多层—低层”混合型社区。在这样的社区中,必须设有足够的公共活动空间(如绿地、健身场所等),并对该社区内不同楼型的住户开放。同时,社区的超市、餐饮等服务场所亦应无差别地对所有住户提供服务,以促成不同阶层的居民的交往。有学者把这种模式称作“大混居、小聚居”,认为这样既可以促进阶层间的接触和交往,防止教育、商业和环境等公共资源的过分不合理分布,也可以使不同阶层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其实,这样的居住模式不完全是乌托邦的臆想,过去北京的胡同就往往是三教九流杂居,引车卖浆者与达官贵人混合居住在一起。〔4〕

需要指出的是,混居的方式往往需要政府直接介入。如果市民纯粹通过市场获得住房,分开居住就是必然的现象,这源于市场力量决定“集体消费”,也是导致穷人区、富人区形成的客观原因。因此,政府要做的起码有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完全以富人为销售对象的所谓豪宅、别墅、“高尚社区”,圈占了过多的优越地段,包括市中心区域、商业中心地段、风景名胜区等,政府应对这种趋势有相当的了解和调控,防止优质的公共资源——特定地段的土地和相应的居住区——完全被富裕阶层占有和掌控。二是政府应通过房产政策的引导、社区建设的规划、土地转让的特定倾斜等措施和手段,鼓励和引导地产商多开发混合式的居住区,使不同经济背景和收入水平的居民有可能住进同一个小区。

参考文献:

- 〔1〕〔法〕勒·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M〕.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2004.
- 〔2〕赵和生.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
- 〔3〕〔美〕约翰·M·利维.现代城市规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80.
- 〔4〕孙立平.理性看待富人区问题〔N〕.经济观察报,2006-03-01.

责任编辑:李 放